

ZHONGGUO WENXUE
SHILIAOXUE

中國文學
史料學

潘樹廣 主編

黃山書社

潘树广 主编

中国文学史料学



主要执笔者

(按执笔字数多少为序,前三人为编委)

潘树广 黄镇伟 曹林娣
涂小平 ~~陈桂芳~~ 赵 明

黄 山 书 社

责任编辑：王克谦
封面设计：舒 畅

中国文学史料学
(全二册)

潘树广 主编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金寨路 283 号)

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2.125 字数：1030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4000

ISBN7-80535-320-4/I·71

上、下册平装 16.00 元

定价：上下册精装 21.50 元

第五编

文学史料分论(上)

第五编 文学史料分论(上)

本编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史料。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料,面广量大,种类繁富。为了系统而有重点地评介,本编的章节安排,采用依时序次和专题集纳相结合的方式。第一章先追溯中国文学史料滚滚巨流的源头——先秦文学史料。第二至第七章分述历代诗文总集、别集、诗文评论资料和词、散曲、小说、戏曲曲艺史料。自第八章起,依次论述敦煌文学史料、民间文学史料和民族文学史料。

各类文学史料版本众多,本编着重介绍主要的版本,尤其是近数十年来整理出版的校点本、笺注本、影印本。有关的参考资料、工具书和研究论著,亦择要介绍。

第一章 先秦文学史料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幼年时期。当时出现的文学样式比较突出的是神话、诗歌和散文，但里面包孕了许多后来才出现的文学样式的因素，故后世有“文体备于战国”之说。由于当时文学本身尚未发展到独立的阶段，所以有许多重要文学史料往往蕴藏在非文学著述中。

有关先秦文学的史料，我们择其要者，分神话、诗歌、散文论述如下。

第一节 神 话

神话(Myth)的涵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神话指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具有幻想性、故事性和原始性。广义的神话则包括某些传说、后代神话等。

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书当推《山海经》，该书对原始社会前期就有零碎记录。但它主要记叙的，是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这一过渡时期人们幻想的反映，也有部分奴隶社会时期的神话。所载神话不仅数量多，而且比较原始，在神话学、宗教学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清代有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阊书业堂刻本)、汪绂《山海经存》(杭州古籍书店1984年影印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抚立雪斋原本石印本)、毕沅《山海经新校证》(乾隆四十六年刻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嘉庆十四年[1834]仪征阮氏卿环山馆刻本)等。从神话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则有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84年重印，附索引)、《山

海经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另有《山海经通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 1984 年版)可供查索。

人们每每与《山海经》对举的是《穆天子传》一书。虽然它只不过是采用一些神话材料而写就的一部神话性质的历史小说,但法国学者雷米·马迪厄认为其中有 48 项神话母题(见李清安《马迪厄〈穆天子传译注与考证〉》,载《读书》1984 年第六期)。《穆天子传》的校注本较多,以檀萃《注疏》(乾隆间石渠阁刊本)、郝懿行《补注》(光绪三十四年[1908]潜庐精刊本)、刘师培《补释》(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为佳。

在先秦采用神话材料创作文学作品的,还有《诗经》和《楚辞》,而以《楚辞》中的神话为多,尤其是屈原《天问》一篇,运用的神话材料更多。《天问》的校注本和研究专著不少,如闻一多《天问疏证》(三联书店 1980 年版)、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 1982 年版)、林庚《天问论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 1989 年版)。当代中年学者萧兵有《楚辞研究》系列论著,包括《楚辞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等,对《楚辞》的神话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先秦的一些史书和诸子著作中也保留了部分神话资料,如《尚书》、《周书》、《左传》、《国语》、《管子》、《韩非子》、《孟子》、《荀子》、《墨子》、《晏子春秋》、《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最后两本书分别成于秦和汉初,但保存先秦神话较多)等。

我国神话比较分散零碎,据报道,袁珂正在从事《中国神话资料汇编》的编纂工作。在《汇编》未出版前,可以利用袁珂、周明编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和刘城淮的《中国上古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前书所采资

料大多录自清以前各种文献，基本上以人物为中心、历史为肩架，按故事发展的顺序安排资料内容。书末附索引，便于使用。后书按神话的发展阶段分为自然性神话、自然社会性神话、社会性神话三大类，大类之下又按作品内容分小类。对每一神话大致分提要、正文、注释、译文、说明等部分，网罗较富。

研究神话，尚有袁珂编的《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国古代神话》（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多次增订，已印行十余次，1984 年增订再版时易名《中国神话传说》）、《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茅盾有《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宗力、刘群编《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黄石《神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据开明书店 1927 年版影印）等可资参考。

第二节 诗 歌

先秦的诗歌大致可以分成三大块：古歌辞谣谚、《诗经》（包括逸诗）、《楚辞》。古歌辞谣谚在本编第九章“民间文学史料”中论述，这里主要谈《诗经》和《楚辞》。

一、《诗经》

《诗经》是经过长时间的收集和整理，成于众手的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 11 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 6 世纪）大约 500 年间的诗歌 305 篇（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6 篇有声无辞的“笙诗”尚不计在内）。在孔子时代，它被称为“诗”或“诗三百”。至汉代，《诗》才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秦火以后，汉时保存研究《诗经》的有四家，即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赵人毛亨毛苌的《毛诗故训

传》。前三家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属今文经学，汉武帝时立于学官，魏晋后逐渐亡佚，仅存《韩诗外传》（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许维道集释本）。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辑录三家遗说较为完备。现今传世的《诗经》即东汉时立于学官的《毛诗》，属古文经学。

《诗经》的内容，按作品性质和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指“国风”，即各国土乐，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15“国风”160篇，多为人民口头诗歌创作，以抒写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诗最多，也不乏揭露统治者丑行的讽刺诗，以及反映劳动人民劳动生产、反徭役、反剥削和压迫的诗歌，为《诗经》中的精华。“雅”共105篇，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是西周的作品，大都叙述周的祖先的重要史迹和武功，其中保存了我国最早的一些史诗。“小雅”大都为周室衰微后的政治讽喻诗，出于贵族文人之手，有揭露和讽刺黑暗现实的成分，其下属歌谣，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人民的同情，是《诗经》的重要部分。《颂》40篇，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周颂》中有的诗描写了大规模农业劳动的情况，反映了周初的繁盛，《鲁颂》和《商颂》是春秋时代鲁国和宋国的宗庙乐歌，文学价值虽不甚高，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诗经》的形式基本是四言诗，但又常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一字句至九字句的格式，错综变化、灵活自由，成为后代各种诗体的滥觞。《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善用章句的重叠表达思想感情等，使其在艺术上取得了高度成就。

《诗经》内容、艺术上的成就，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丰碑。可以说，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诗经》的熏陶。

因为《诗经》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对《诗经》的研究自孔子发轫以后，至汉代兴盛，其后绵延不绝，成为历代学术之大宗，研究

著作当不下千种。因为《诗经》是“经”，所以封建社会大多把它当经学著作研究。然而《诗经》毕竟是诗，把《诗经》当文学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在《诗经》研究史上，经学和文学作为两条分列的线索，在历史平面上时而水乳交融，时而泾渭分明，在历史纵轴上或携手并肩，或分道扬镳。这纵横交错的演进，构成了《诗经》研究史的轮廓。研究《诗经》的著作按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五类：《诗经》考据学、《诗经》义理学、《诗经》文学研究、《诗经》研究史、《诗经》工具书。今选择重要研究著作分类缕述如下。

1.《诗经》考据学 即对《诗经》文字、音韵、字义及所涉及的历史、地理、名物、制度的考释辨证。说诗欲明大义，不可不先通训诂。而对作品背景、作品所涉风俗习惯、器物服饰、礼仪制度，以及版本、异文、校勘的考证，都是对作品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些方面，前人、时贤为我们留下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荦荦大者如：清段玉裁《诗经小学》、陈乔枞《毛诗郑笺改字说》、明陈第《毛诗古诗考》（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清顾炎武《诗本音》、孔广森《诗声类》、汉郑玄《毛诗传笺》（清《十三经注疏》本）、清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陈奂《诗毛氏传疏》（中国书店1984年据漱芳斋1851年刻本影印）、牟庭《诗切》（齐鲁书社1983年据抄本影印）、现代闻一多《诗经通义》（《闻一多全集》本，未刊行之手稿藏北图）、今人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晋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丛书集成初编》本）、清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四库全书》本）、汉郑玄《诗谱》（《郑氏佚书》本）、清朱右曾《诗地理徵》、包世荣《毛诗礼征》（《木犀轩丛书》本）等。

以上未注版本者，均有《皇清经解》或《续皇清经解本》。

2.《诗经》义理学 即阐发《诗经》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以及结合《诗经》对于社会政治、历史、思想、文化所作的广泛议论和批评。“五四”以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性研究，但用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探讨《诗经》文学性的专著则在“五四”以后。故此前论《诗经》者，放在“义理学”中论列。名著有：

唐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宋欧阳修《毛诗本义》(《通志堂经解》本)、王安石《诗义》(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诗义钩沉》)、王质《诗总闻》(《丛书集成初编》本)、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严粲《诗缉》(《四库全书》本)，清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顾颉刚标点本)、崔述《读风偶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本)、魏源《诗古微》(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林光义《诗经通解》(衣好轩1929年排印本)等。

以上所谓考据学、义理学之分仅就其主要内容说，实则考据中有义理，义理中有考据，难作泾渭之分。

3.《诗经》文学研究 传统学者把《诗经》当作经学研究，“五四”以来涌现出一大批以新观点、新方法，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的专著，如：

俞平伯《读诗札记》(人文书店1983年版)、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

4.《诗经》研究史 即在一定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对《诗经》研究历史的回顾和总结。“五四”以前《诗经》研究史被纳入经学研究史中，“五四”以后，随着《诗经》本来面目的恢复，出现了反映《诗经》各方面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历史的专著，如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5.《诗经》工具书 即有关《诗经》研究的辞典、目录、索引等。有向熹《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振铎《关于诗

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原载《小说月报》14卷3号,1923年出版,后收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研究》)、赵沛霖《诗经研究书目》、《诗经研究论文分类目录索引》(俱附《诗经研究反思》之末)、吴用彤《诗经索引》(据《诗经》英译本编制,原西德汉堡1975年出版)、陈宏天、吕嵒《诗经索引》(吸收1934年哈佛燕学社引得编纂处《毛诗引得》长处编成,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等。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有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之外的,前人称之为“逸诗”,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诗经》所收而后散佚的,尚难断定。“逸诗”总数不多,散见于《国语》、《礼记》、《穆天子传》、《左传》、《孟子》、《周书》等先秦古籍中。清代郝懿行有《诗经拾遗》1卷,收入《郝氏遗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重版)“逸诗”部分,辑录较为完备。

二、《楚辞》

“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指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又称“辞”或“辞赋”。楚辞的主要作家是屈原,因屈原《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故后人又以“骚”代指“楚辞”。《楚辞》则是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及汉人模拟作品为一编的诗歌总集。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具有“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黄伯思《校定楚辞序》)的特征,又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中国文学、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诗》、《骚》并称,分别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博大邃远的思想、热烈奔放的情感、奇诡丰富的想象、绚烂瑰丽的文采、精巧深刻的描绘、宛转和谐的韵律、比兴寄托的手法等,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对后代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向在前人的基础上,辑成《楚辞》16篇,包括屈原的《离骚》、

《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和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时，又附己作《九思》于卷末而成 17 卷。其中《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是否屈原作品，尚有争论。《招魂》也有屈原作、宋玉作二说，但近世学者多主屈原。

历代《楚辞》研究之作汗牛充栋、林林总总。即专著而论，已不下数百种，今就其要籍按其主要内容约可分为四类：

1.《楚辞》考据学 即对《楚辞》章句、字音、字义、文字异同，乃至所涉及的历史、地理、名物等的考释辨证。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丛书集成》本）、隋释道安《楚辞音》（有敦煌旧抄残卷，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点校本），朱熹《楚辞辨证》（附《楚辞集注》后），清戴震《屈原赋注》、《屈赋通释》、《屈赋音义》（清光绪十七年 [1891]《广雅书局丛书》本），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附《楚辞余论》《楚辞说韵》（中华书局 1958 年版），胡文英《屈骚指掌》（北京中国书店 1978 年据清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富艺堂刊本影印），近代马其昶《屈赋微》（民国初年北京铅印单行本），现代闻一多《楚辞校补》《离骚解诂》《天问释天》（三文俱收入《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朱季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 1963 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新 1 版），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 1988 年版），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 3、4 期；又附《泽螺居诗经新证》末，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等。

2.《楚辞》义理学 即略陈或详说每篇每章乃至每句的大义理论、艺术特征以及结合《楚辞》对社会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等所作的广泛议论和批评。《楚辞》义理家最为庞杂，而显者少，举其大者

如：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出版铅印本）、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断句排印本）、林云铭《楚辞灯》4 卷（清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刊本）、刘梦鹏《屈子章句》7 卷（清乾隆五十四年 [1789] 藝青堂刊本，嘉庆刊本）、黄寿祺等《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马茂元《楚辞注释》（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熔考据、义理为一炉，集历代旧注为一家，别出己见者，当推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全书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五编，已出《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中华书局分别于 1980、1982 年出版）。

3.《楚辞》研究史 对《楚辞》研究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的著作。如：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着重回顾现代对《楚辞》研究的历史；黄中模《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则偏于《楚辞》著作权和屈原有关问题论争的历史。

4.《楚辞》资料、工具书 即有关《楚辞》研究的辞典、丛书、书目、索引等。如：姜亮夫《楚辞通故》（齐鲁书社 1985 年版），全书分十部，部下分类，凡 56 类，类下列字词，书末附笔画索引。本书集前人训释之大成而别出己义，实为一部大型《楚辞》词典。今天所编有关《楚辞》研究的专门丛书主要有：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1986 年版）收书 5 种：《楚辞注释》、《楚辞要籍解题》、《楚辞评论资料选》、《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台湾杜松柏主编的《楚辞汇编》（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版），分 10 册收录了明清名著 13 种，近人著作 10 种：《楚辞述注》、《屈原赋证辨》；《楚辞听直》；《楚辞疏》；《屈子章句》、《楚辞札记》；《屈辞精义》、《屈骚指掌》；《楚辞新注求确》、《楚辞新注》；《楚辞释》、《屈赋微》、《楚辞拾遗》；《楚辞解故》、《离骚正义》、《楚辞考异》、《离骚补注》；《离骚辨》、《屈原》、《楚辞大义述》、《读骚大例》；

《楚辞论文集》、《楚辞研究》。书目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1 年版，另有《补逸》载入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饶宗颐《楚辞书录》（香港《选堂丛书》本），洪湛侯等《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日人竹治贞夫编的《楚辞索引》（日本德岛大学 1970 年订正版；台北中文出版社 1972 年初版，1979 年再版）。

以上仅就专著而言，单篇论文举不胜举。有几种论文集为《楚辞》研究专家多年的心血结晶，胜解颇多，如：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 1984 年版）。也有就某一专题编就的论文集，如黄中模编《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等。

第三节 散文

我国散文历史悠远，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以及《周易》中的卦爻辞可以说是初期散文的代表，其特点是内容驳杂零乱，多为零散的句子，衔接成章的不多。而周、秦时期出现的大批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名著，大多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介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几部较重要的著作。

一、历史散文

《尚书》是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标志。《尚书》因年代久远，几经聚散，真伪杂糅，自汉代始又有今古文之争。汉初，存秦博士伏生所传《今文尚书》29 篇。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尚书传》），比《今文尚书》多出 25 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 5 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泰誓》已佚，故伪古文与今文共 58 篇。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据乾隆十年

[1745]年刻本影印，并据别本补足)透辟地论证了《古文尚书》是伪书。历代注释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显者如：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宋蔡沈《书集传》(《四库全书》本)、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点校本)等。顾颉刚《尚书通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据燕京大学1936年版影印)为逐字索引，查检方便。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虽记事谨严，对史学发展影响很大，但文学意味不强。《春秋》被奉为“经”，为“经”作解释的书叫“传”，战国时为《春秋》作传者有三家，即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鲁人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传为鲁左丘明作的《春秋左传》。前两书偏重说理而略于记事，文学价值不大，《左传》则熔历史真实性、思想倾向的鲜明性、语言的形象性为一炉。它与记言为主的国别体史书《国语》、《战国策》，同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优秀代表(关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的重要注本，第二编第三章已作介绍)。

别具一格的《晏子春秋》，是专门记载春秋时齐国晏婴言行的散文作品。其中有许多结构完整、主题鲜明的小故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故编列史部传记类。近人吴则虞有《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较为详备。骈字麌的《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充分利用银雀山汉墓竹简，校与释均多前人未及之处。

二、诸子散文

如果说历史散文偏重于记述，那么，为宣传诸子学说服务、具有复杂哲学思想的诸子散文则偏于论说。春秋末年，“士”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针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提出各自的主张，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各家著述繁博，由此也可见出论说文在此期间的迅猛发展。这里我们只选择诸

子中文学性较强的著作略予介绍。

语录体散文《论语》的出现，显示了中国散文内容和风格的重大变化。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较重要的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俱收入《十三经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近人杨树达《论语疏证》（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2出版，多次重印），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此期的语录体散文还有《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是文物出版社1976年据现存最古本影印的。清毕沅有《老子道德经考异》（《经训堂丛书》），今人任继愈有《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修订版）。还有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7年版）、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等都是研究《老子》较重要的著作。

《墨子》的散文虽不重文采，但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近人谭戒甫《墨辨发微》（中华书局1964年版），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墨子校释商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较精审。

《孟子》颇富文采，尤以气胜。其重要注本有：东汉赵歧、宋孙奭《孟子译注》（收入《十三经注疏》），朱熹《孟子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点校本），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等。

《庄子》的文学性很强，历代大作家几乎无不受到其熏陶。《庄子》注本也很多，现当代以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朱季海《庄子故言》（中华书局1987年版）较佳。

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标志着先秦论说文体的完全成熟。《荀子》注本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取